

绪 论

第一节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已成为国家文化战略与对外交流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国家战略框架中。国际中文教育已从单纯的语言教学拓展为集语言传播、文化交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事业，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当前，全球中文学习的热潮持续升温，需求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24 年 9 月，已有 85 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际中文学习者和使用者累计已超过 2 亿人，195 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来华求学，学历生比例提高到 60% 以上。^① 国际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外人文交流搭建了坚实桥梁，更以语言为纽带促进了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生动彰显了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历程与中国历史演进、中外交往进程密切相关。追溯其源头，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经济往来与文化开放程度，共同塑造了国际中文教育的阶段性特征。汉朝作为中外交流的早期开拓者，凭借“丝绸之路”的贯通，开启了国际中文教育的起步阶段，为语言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唐朝以强盛国力与开放姿态，迎来了国际中文教育的鼎盛时期，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文化教育中心；宋元至明清时期，虽历经起伏，但在海上贸易与中西初识中延续着语言交流的脉络；民国时期在近

^① 中国新闻网：《教育部：已有 85 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cns-d/2024/09-26/news1001088.shtml>，2024 年 09 月 26 日。

代化浪潮中探索出新的教育路径；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汉语教学体系逐步建立，推动了国际中文教育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梳理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不仅能明晰其历史脉络，更有助于把握国际中文教育与国家发展、文明交流的深层关联。

一、汉朝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肇始

汉朝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化传播与“丝绸之路”的开辟密不可分。“丝绸之路”不仅成为商贸往来的通道，更成为汉语与中原文化向外传播以及文化沟通的核心媒介。^①这一时期，匈奴等外族开始派遣学生前来学习汉语，标志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雏形的出现。而外国人或外族人真正成批进入中原学习汉语，则始于东汉初年。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由此可见，早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匈奴贵族子弟已进入东汉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研习儒家经典，其学习过程自然包含对汉语的系统掌握。尽管这一阶段的汉语教学尚未形成规范化规模，教学内容与形式也较为简单，但已具备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初步形态，为后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唐朝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鼎盛时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开放时期，凭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奠定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亚洲的文化教育中心。这一时期，国际中文教育在规模、范围、制度保障等方面均达到中国古代历史的顶峰，形成“四方来朝、学者云集”的鼎盛局面。

（一）留学生规模与来源的空前扩展

唐朝的汉语学习者数量之多、来源之广远超前代。以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为主，两国频繁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华。公元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批“遣唐使”。到公元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3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人唐使”和“送客唐

^①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均记载了汉语随着使节往来和贸易活动进入西域的历史。

使”共3次。^①从8世纪初起,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人数大增,如公元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②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到唐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在长安设有新罗馆。东南亚的越南、南亚的印度、中亚的波斯等国也有学子来华,形成“东起日本海,西至波斯湾”的汉语学习圈。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留唐54年,精通汉语诗文,与李白、王维等诗人结为挚友。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来华,18岁考中唐朝进士,其汉文著作《桂苑笔耕集》成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经典。^③

(二) 制度化的教育保障与教学实践

唐朝设立了专门的留学生教育机构和管理机构,提供了系统的汉语和儒学经典教育。国子监作为接收外国留学生的主要教育机构,下设太学、国子学等,专门接收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子一同学习,享受与中国学生同等的教育资源。鸿胪寺是留学管理机构,为外国留学生和僧人建立学籍档案,并按规定提供日常用品,安排食宿,保障留学生的生活、医疗待遇的供给。^④此外,唐朝设置了“宾贡进士”考试制度,这是专门为外国留学生设置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些政策极大降低了留学生的学习门槛。

(三) 文化传播影响深远

唐朝的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留学生回国后,将汉语、汉字及唐朝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技知识带回本国。日本在遣唐使影响下以汉字为基础创制“假名”文字,推行“大化改新”,汉诗文成为日本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全面引入汉字,以汉文为官方文字,汉文学在高丽王朝时期达到鼎盛。东南亚的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书写系统,汉文化成为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汉语为纽带的文化输出,使唐朝的语言与文化辐射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奠定了汉语在古代东亚国际交流中的核心地位。

① [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56-78页。

② 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商务印书馆,2009,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27页。

④ 王继红:《隋唐对外汉语教学史考》,《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三、宋元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延续

宋元时期是国际中文教育从官方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王朝虽未形成唐朝万国来朝的政治强势，但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疆域拓展，国际中文教育在继承前代核心传统的同时，呈现出交流范围扩大、主体多元、功能实用化的转型特征，实现了从政治附属到商贸刚需的功能延伸。

（一）汉字与儒家经典传播的稳定传承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918—1392）延续对汉文化的推崇，官方设“成均馆”传授儒家经典，汉字为官方唯一书写系统。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国王多次遣使求购宋版儒家典籍，科举考试以汉文诗赋、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高丽末至李朝初期，朝鲜半岛还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习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被学者称为“古代朝鲜半岛最早的汉语教科书”。^①张西平（2019）指出，它们的出现具有开创意义，实现了从词汇教学到课文教学、从书面语教学到口语教学、从语言要素教学到语言交际技能教学的转变，标志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依附经典的“隐性教学”走向独立系统的“显性教学”。^②

尽管宋元与日本官方往来减少，但民间僧侣、商人交流频繁。日本镰仓、室町时期的“入宋僧”“入元僧”来华求法，不仅研习佛法，更系统学习汉文典籍与诗歌创作，回国后将汉语佛教术语与诗文传统带入日本，推动汉文学在日本僧侣阶层的传播。越南陈朝（1225—1400）延续“科举取士”制度，以汉文为官方文字，朝廷文书、史书编纂均用汉字，儒家经典仍是教育核心内容，汉语作为“文治工具”的地位在越南传统社会中持续巩固。^③

（二）汉语传播范围从东亚内陆向东南亚、南亚的海路扩展

宋元时期，汉语传播范围突破传统东亚圈，向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延伸，这与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直接相关。宋朝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成为“海上瓷路”的枢纽，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等中

① 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商务印书馆，2009，第37页。

② 张西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第118-136页。

③ 丁克顺：《越南儒学科举及其对越南文化与教育的贡献》，《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1期。

外商人在此云集。为满足商贸需求，民间出现了“通事”，他们既懂汉语又通外语，在交易中承担翻译角色，同时也成为汉语实用表达的“非正式传播者”。

（三）教育主体从官方主导到民间主体参与

宋元时期，由政府主导的留学生制度弱化，汉语传播更多依赖民间商人、僧侣与华侨等多元主体。唐朝留学生以儒家经典、诗文辞赋为核心学习内容，而宋元时期的汉语学习增加了更多实用需求。商人需学习交易术语，旅行者需掌握日常交际用语，宗教人士需理解佛经汉译文本中的特殊词汇。《老乞大》《朴通事》以对话形式模拟商贸、日常交往场景，直接服务于口语交际，正是这种“实用优先”转向的体现，使汉语教学从“文化精英教育”向“生活工具学习”下沉。

四、明清时期：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滞缓

明朝的国际中文教育经历了从前期有限开放到中后期封闭收缩的转变，整体延续性逐渐弱化。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曾短暂推动中外交流，东南亚、南亚部分国家（如暹罗、满刺加等）因朝贡关系与明朝保持联系，使节与商人需学习基础汉语以完成朝贡礼仪与贸易沟通。同时，明朝与朝鲜半岛（李氏朝鲜）、越南（安南）的传统交流仍在延续。李氏朝鲜尊奉朱子学，其官方教育以汉文典籍为核心，科举考试沿用汉文，民间仍使用《老乞大》《朴通事》等汉语教材。越南后黎朝（1428—1789）延续“汉字—儒学”教育体系，汉语仍是其官方与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这一阶段，国际中文教育在东亚传统圈保持着有限活力。

明中叶嘉靖年间，为防倭寇实行严格海禁，中外交流渠道收窄。官方对外国留学生的接收大幅减少，民间商贸虽未完全中断，但汉语传播多局限于“通事”等少数群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中国澳门，随后迅速投入汉语学习。他不仅自己掌握汉语，还编写汉语教材、教学词典，亲自教授新来华的传教士汉语，为西方传教士群体融入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奠定了语言基础。不过，这一时期传教士的活动主要聚焦宗教传播，尚未形成广泛、系统的汉语教学实践。

清朝的对外政策以“闭关锁国”为核心，中外交流渠道被严格限制，国际中文教育陷入全面滞缓，甚至出现历史性倒退。值得一提的是，1879年，戈鲲化受美国哈佛大学聘请，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首位正式受聘的中国籍语言教师，登上哈佛讲台讲授中文与中国文化。他此前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翻译兼中文教师，有着丰富的与外国人打交道及教授西方学生汉语的经验。戈鲲化抵达哈佛后，开设汉语课程，还编纂《华质英文》。这是中国人为西方人编写的、最早的中英文对照诗词自译集与汉语教材，收录其自作诗词并附英译与注解。^①他坚持穿着清朝官服讲课，要求学生尊重中国传统师道尊严。^②戈鲲化作为中国本土学者登上哈佛讲台，是中国文化主动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更是中美学术平等对话的历史先声，其价值在当代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中仍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五、民国时期：国际中文教育的近代化探索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革期。受“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思潮推动，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突破了明清时期的封闭滞缓状态，开启了从“传统经验型”向“现代制度化”的近代化探索。尽管受战争动荡、国力孱弱等因素制约，这一时期的实践仍在教育理念、体系构建、方法创新等方面为后世国际中文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受西方语言学、教育学理论影响，民国时期国际中文教育在教学理念、方法和教材上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突破。语言学家黎锦熙将西方语法理论引入汉语研究，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著国语文法》，是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奠基之作，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在此时期，一批专门面向外国人的中文教学机构陆续建立。其中，华北协和语言学校颇具代表性。该校始建于1910年，后由北京多家美英传教机构联合主办，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更名为燕京中文学校。值得注意的是，燕京大学以在西方教育体系下培育中国人才为目标，而其下属的这所中文学校，则将中国语言与文化传授给西方人。在十余年间，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

① 建滨、朱黎慧：《戈鲲化〈华质英文〉的编写理念探究》，《汉语国际教育学报》2022年第2期。

② 施正宇：《戈鲲化与早期美国汉语教学》，《对外汉语研究》2007年第00期。

家，对中文的国际传播及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民国时期开始有组织地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于1924年9月至1929年6月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参与录制了“灵格风”汉语教学唱片，不仅录制了教材中的朗读内容，更亲自用毛笔书写教材中的中文字。该教材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在英国广泛使用，深刻影响了当时英国人的汉语学习。1939年年初，著名记者、文学家萧乾也收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函，受聘为中文系讲师，教授现代汉语，延续了中国学者在西方高等学府传播汉语的实践，推动汉语教学在欧洲的持续开展。

六、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中文教育的规范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中文教育进入系统化、制度化的规范化发展阶段。在国家战略支撑、政策引导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国际中文教育从对外汉语教学的初步探索，逐步发展为覆盖全球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在理念定位、制度建设、资源供给，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实现全面规范，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外文明交流的核心载体。

（一）奠基期（1949—1978）：从服务外交需求到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1950年，清华大学设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标志着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正式起步，这是首个专门面向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机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于1962年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所专门面向外国留学生开展汉语教育的高等院校。这一时期聚焦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基础教学，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1958）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系统面向外国学习者的对外汉语教材，系统涵盖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知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指导，注重语言规则的讲解与操练，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从零散的传统经验型教学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现代体系。受冷战环境影响，这一阶段的国际中文教育主要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生数量有限，但“以教学机构为依托、以大纲教材为规范”的模式，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① 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商务印书馆，2009，第90-95页。

（二）发展期（1978—2000）：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体系化规范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中外交流扩大，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从“外交附属”转向“独立学科”。1983年，“对外汉语教学”被正式列为独立学科，纳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范畴。1987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国家汉办”）成立，统筹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进入“国家统筹、学科自主”的规范化新阶段。1988年，国家汉办颁布《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首次构建了分阶段、分技能的教学标准体系。教材编写从“通用基础型”向“分国别、分层次”细化，如针对欧美学习者的《新实用汉语课本》，针对日韩学习者的《韩国人学汉语》《标准汉语教程（日语版）》等，适应不同学习者需求。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外国留学生规模大幅增长，来源从社会主义阵营扩展至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1年，国家汉办开始在海外设立“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HSK成为国际认可的汉语能力标准，标志着汉语测试进入规范化、国际化阶段。

（三）全球化推进期（2000年至今）：从“对外汉语”到“国际中文教育”的全面规范升级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国际中文教育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实现“内涵扩容”与“全球覆盖”，规范化水平达到新高度。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平台，推动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在全球规范化落地。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全球161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499所孔子学院和764个孔子课堂^①。

2019年12月，以“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召开，时任孙春兰副总理在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完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体系，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②2020年6月，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承担起制定实施国际中文教

① 张欣、郑翊：《20年，孔子学院大胆创新砥砺前行—纪念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主题研讨会观察》，《中国教育报》2024年11月18日，第1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cns-d/2024/09-26/news1001088.shtml>，2024年09月26日。

育总体战略、建设系列国家标准、管理资源体系等职责,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此后,一系列标准性文件相继发布,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2021)、《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2022)等,从语言能力评估、文化教学规范、教师专业素养等维度构建系统框架,推动学科建设科学化、规范化,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明确指引;《国际中文在线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5年)》《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建设指南(试行)》(2021)等文件,则推动资源体系全面升级,为教学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持续聚焦标准精细化、资源系统化、应用场景化,进一步深化标准体系建设,相继出台了《职业中文能力等级标准》(2023)、《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2023)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2024),这些标准与资源建设、数字化平台协同发力,强化了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中外文明交流纽带的功能,助力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语言教育生态。

第二节 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特点与核心内涵

一、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特点

(一) 学科属性:跨学科融合的综合特征

国际中文教育不是单一学科的独立发展,而是多学科理论与实践交叉融合的综合领域。^①中国语言文学提供汉语本体知识和中华文化根基,外国语言文学贡献语言习得规律、跨语言对比视角及外语教学法理论,教育学奠定教学原则、课程设计、课堂管理与评估的理论基础,文化传播学指导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与文化教学策略,心理学揭示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记忆

^① 吴应辉、梁宇:《交叉学科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构建》,《教育研究》2020年第12期。

规律、动机激发与情感因素，国际关系学则有助于理解语言教育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背景及其影响。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国际中文教育理论大厦的基石。这种跨学科融合的特性，让国际中文教育既能把握语言教学的本质规律，又能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复杂需求。

（二）教学对象：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需求

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对象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来自学习者在文化背景、语言基础、学习动机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教学必须重视“差异化需求”。从文化背景看，学习者来自全球不同文化圈，既有受汉字文化影响较深的日韩学习者，也有来自欧美、东南亚、阿拉伯等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他们的文化认知和思维方式各不相同。从语言基础看，学习者的母语与汉语亲缘关系差异很大，比如，日韩学习者对汉字认读有优势，但容易受母语干扰；欧美学习者则面临声调、汉字书写等独特难点。从学习动机来看，有的为来华留学深造，有的为职业发展需要，有的则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这些差异要求国际中文教学不能“一刀切”，必须通过分层教学、针对性教材设计等方式做到因材施教。

（三）教学目标：语言能力、文化传播与“知华友华爱华”的一体共育

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目标以“语言能力、文化传播、知华友华爱华”三位一体为核心，三者相互赋能、协同推进。语言能力是基础载体，聚焦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的系统习得，通过阶梯式训练提升听、说、读、写、译技能，为文化理解与情感培育提供工具支撑。文化传播是认知纽带，依托语言教学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践，在对比中培育文化包容性，引导学习者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知，为“知华友华”奠定基础。“知华友华爱华”是情感与实践的升华，通过语言与文化学习理解中国，在互动中建立友好态度，最终形成情感认同，引导学习者自觉成为中国声音的参与者、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和平发展理念的支持者。三者共生共荣，语言学习融入文化场景，文化传播依托语言载体，情感培育渗透于互动过程，共同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育人目标。

（四）实践形态：本土化适配与全球化布局的统一

国际中文教育的实践呈现“本土化适配”与“全球化布局”相互支撑的特征。这既是其应对全球多元需求的策略选择，也是从“对外汉语教学”演进至“中文全球发展”的核心逻辑。本土化适配强调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适配本地教育生态。同时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海外华文学校传承祖语文化，各国官方教育机构开发本土课程，形成“中国推动、国外主导、中外合作”的协同网络。全球化布局则为本土化提供了系统支撑。一方面，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职业中文能力标准》等规范为框架，确保全球教学质量基准统一。另一方面，依托“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HSK 全球网络”等载体，实现优质教学资源跨地域流动，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全球发展推进中文发展，以中文发展推进全球发展。^①

二、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内涵

2019年12月9日至10日，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是继连续举办13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后，首次以“国际中文教育”命名的高规格会议，大会主旨报告统一使用了国际中文教育的表述。^②究竟何为国际中文教育，目前学界并未有明确的界定。按照有关文件的表述：“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快速走向世界，各国学习中文需求持续攀升、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应运而生的，与国际中文教师职业紧密衔接，承担着满足各国民众学习中文需求，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建设发展培养合格中外专业人才的重要任务。”“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项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事业。”“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加快走向世界。”^③结合上述表述，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内涵可从时代使命、核心任务、价值导向与发展目标四个层面综合阐述，体现了语言教育、文化传播与国家战略

-
- ① 胡范铸、郭晔丹：《从“对外汉语教学”到“中文全球发展”：“国际中文教育”观念史的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cns-d/2024/09-26/news1001088.shtml>，2024年09月26日。
- ③ 对外汉语网：《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简介及基本要求正式发布！》，<https://www.dwhy.net/article-1633-1.html>，2024年1月26日。

需求的有机统一。

（一）时代使命：筑牢中国与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崛起、文化影响力提升与全球化进程深度耦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各国学习中文需求持续攀升的直接回应。其本质是全球化进程中语言供需关系与国家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既承载着满足国际社会中文学习需求的基础性责任，也肩负着让世界通过中文更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时代使命，是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语言桥梁。

（二）核心任务：以人才培养为基石衔接学习需求与中文传播实践

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围绕人才培养与需求响应两大维度展开。一是培养合格中外专业人才，这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通过培育既懂中文教学又通跨文化沟通的中外人才，为全球中文教育实践提供人力保障；二是满足各国民众学习中文的需求，从个体层面回应学习者的交流、发展需求，从群体层面为中文在国际社会的应用与普及筑牢根基。以上两点共同服务于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实践目标。

（三）价值导向：服务国家战略与深化文明互鉴的统一

一方面，明确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属性，与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紧密衔接，通过中文的国际传播为国家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强调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人文属性，并以中文为媒介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让中华文化通过更自然、更贴近当地需求的方式走向世界。

（四）发展目标：构建可持续高质量的全球教育新格局

面向未来，其核心发展目标是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可持续意味着需尊重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文化传统与学习需求，推动本土化实践，避免单一模式复制；高质量则要求超越基础语言技能教学，融入更深厚的文化理解、更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性与影响力。这一目标最终指向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加快走向世界。

综上，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内涵是，植根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时代背景，以培养专业人才为支撑，以满足国际中文学习需求为基础，以服务国家战略与深化文明互鉴为导向，最终致力于构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格局、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在平等对话中走向世界的综合性国际教育事业。

| 拓展阅读

1. 施春宏：《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李立冬：《新时代来华留学生知华友华教育：内涵、目标、原则与路径》，《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3. 匡昕、冯丽萍：《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理路与进路》，《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第 5 期。
4. 曹贤文、李蕊君：《国际中文教育学科框架与内涵构想》，《语言战略研究》，2023 第 6 期。